

日本文化比较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田 文 军

作 者 田文军,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日本 文化 比较研究

提 要 日本民族注重文化比较研究, 热心吸纳异民族的文化成果, 这是其成功实现民族文化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考察日本文化比较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将有益于我们思考自己的民族文化建设。

日本经过战后 50 多年的奋斗,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如果从广义的文化角度探视今天的日本, 也可以说日本已是当今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国土面积狭小, 经济资源贫乏, 但自明治维新以来即称强于东亚诸国; 直至今天, 在二战以后重新崛起, 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其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缘由, 值得我们追求民族文化复兴的中国人认真思考。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 日本民族在自身文化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程中, 不断地摄取、容纳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 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而这种摄取、容纳异民族文化成果的动力和热情, 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又源于日本学术界长期自觉地文化比较研究。因此, 我们对日本文化比较研究的现状、趋势作一些总体性的考察, 会有益于自己思考现实的民族文化建设和发展。

一、日本民族的文化比较意识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 离不开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往, 离不开该民族文化的主体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融会。文化认同与文化融会是以文化比较为前提的, 文化的发展也总是同文化比较关联。文化发展的这种契机, 使得文化比较成了世界上所有关心自身文化发展的民族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日本民族即是世界上最关注文化比较研究的民族之一。历史上, 由于其生存的岛国环境, 日本民族对

于异质的民族文化, 即有着一一种特殊的热情和敏感, 极其善于将异民族的文化成果容纳入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今天日本民族的文化, 即是以日本本土文化为基础, 吸纳融会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果。这使得文化比较意识, 已成为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日本民族强烈的文化比较意识的现实表征, 首先是当今日本学术界对文化比较研究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今天, 日本的文化比较研究机构之多, 文化比较研究成果之丰富, 都是世界上少有其他民族可与之比拟的。

日本学术界, 文化比较研究的重镇是高等院校。在日本, 不仅象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这类历史悠久、学术力量雄厚的高等学校重视文化比较研究, 即使规模一般的大学也十分重视文化比较研究。在日本的许多大学中, 都附设有专门的文化比较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不仅配备有专门或兼职的研究人员, 开展和组织各种类型的文化比较研究, 而且大都独立地编撰出版有自己的文化比较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 我们可以看到东京大学出版的“比较文化丛书”, 看到玉川大学、九州大学出版的有关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论著; 也可以看到中央学习院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这类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版的研究成果。日本

的创价大学是一所70年代建立的大学,该校的比较文化研究所编印的《比较文化研究》也有了10多卷,已具备相当规模。

日本的高等院校不仅重视文化比较研究,而且注意将文化比较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积极地培养文化比较研究的专门人才。日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70年代即开始在研究生院筹备比较文化研究专业,计划开设比较文化方面的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并为此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日本研究社70年代后期出版的《比较文化的进展》一书,实即是国际基督教大学研究生院为筹备比较文化专业而开设的“比较文化”讲座的结集。论集中收入了大久雄、井门富二夫、山本达郎等人探讨开展文化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问题的研究成果。80年代成文堂出版的《比较文化的进展》,则是早稻田大学开展的“社会科学总合研究”这一课题中的“比较文化”部分的研究成果。早稻田大学开展的“比较文化”研究中,也曾开设讲座,课题有“东西文明的融合”,“欧美文化与日本”,“日本人与俄罗斯人”,“日本文化论之现在”等。日本大学中开设比较文化课程,从内容方面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开设具体的文化比较课程,这种课程是从不同的层面或以不同的视角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高校曾开设的“比较文化”课程中不少内容都具有这种性质。另一种情况是将比较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理论,讲授“比较文化论”。在日本比较早地开设这种课程的有筑波大学、津田塾大学等高校。这种“比较文化论”的视点在宏观的总合的文化比较,在文化比较的理论与方法,而不专注于对某一层面、某一领域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但不论哪种内容的“比较文化”教育,都表明了日本大学中对“比较文化”研究和教育的重视,都体现了日本民族强烈的文化比较意识。

日本民族强烈的文化比较意识的另一具体表征,是日本出版界对于推出文化比较研究成果倾注的热情。日本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出版机构之多,印刷业之发达举世闻名。一般而言,在日本这种现代商业社会中,出版业不能不受市场需要和商业利益制约。但在出版文化比较研究成果方面却似乎例外。出版界在推出文化比较研究成果时,不是被经济利益所左右,而是由一种有别于商业利益的文化价值观念支配和驱使。这种文化价值观念使日本的出版界,除中国人较为熟悉的岩波书屋之外,尚有中央公论社、朝日出版社、大修馆书店、平

乐诗书店、有斐阁、角川书店、学生社、理想社等数十家规模不等的出版社,在不同时期出版过文化比较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少是丛书式的。例如研究社出版的比较文化讲座即包括《日本列岛文化史》《亚细亚人与日本人》《西欧罗巴与日本人》《日本人的生活》《日本人的技术》《日本人的社会》《日本人的价值观》《比较文化展望》等,整套丛书规模相当可观。

在日本,除了大学和出版界重视文化比较研究,注意推出文化比较研究成果之外,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也十分关注文化比较研究。日本的“NHK”即曾开设讲座,讨论西方文明对日本的影响,“NHK”还曾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开展社会调查,编辑《日本人的宗教意识》《现代日本人的意识构造》等论著出版。80年代,为了应对全世界对东亚工业经济发展的关注,日本文部省还曾资助过《关于东亚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总之,留心日本的文化比较研究,我们会发现,在日本,从政府部门到新闻媒体,从高等院校到出版机构乃至社会团体,对文化比较研究都持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的态度。可以说全体日本人民都非常留意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认识自己的国家、民族,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文化比较研究已经成为日本民族思考自身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日本文化比较研究成果的类型

文化比较是一个内容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日本学者认为,在这一领域中,“比较文明”、“比较文化”、“比较思想”在层次上实际是有区别的。这种观念,使日本学者虽然将文化比较研究成果都归之于“比较文化”,或称之为“比较文化论”,但在这些“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化论”中,作者的学术视野、理论旨趣以及作者所关注和涉猎的文化现象或文化领域是各不相同的。在“比较文化”中,有的学者在文化比较中涉及到的是技术、文明,有的学者涉及的是历史文化,有的学者所关注的是思想理论。这些差别,使得日本学者对于日本“比较文化”发展的历史谱系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果依据日本“比较文化”研究成果的内容,对这些成果进行归类考察的话,我们大体上可以将日本文化比较研究成果区别为四种类型:一是从种族、地域、习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文明以及民族文化近代化历程等方面进行的文化比较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一般可以统称之为“比较文化论”。二是从哲学、

宗教、伦理、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文化比较研究。这一类研究成果谓之“比较思想论”。三是研究和探讨文化比较研究的原则、方法。这一类研究成果谓之比较文化方法论，或比较哲学方法论。四是将“比较文化论”视为一种宏观的总合性的文化理论，从文化理论的角度理解和思考文化比较研究。作为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化论”在内容方面，同一般的“比较文化论”或“比较文化方法论”都有所区别。

在当代日本文化比较研究的成果中，涉猎一般“比较文化论”的学者最多，这类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这类成果大都是从一个非常具体的文化领域，对日本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例如前面提及的1984年成文堂出版的《比较文化的进展》一书中，曾收入霜田美树雄的研究成果。霜田的文章题目是“日本人与俄罗斯人”。文章中不仅一般地论及斯拉夫民族中的俄罗斯人，而且具体地考察了俄罗斯人的风土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民族特性等。再基于这样的考察，对日本民族与俄罗斯民族进行比较，求取对这两种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和“等质性”的认识和理解。1977年，荒竹出版社还曾推出山本浩的一部译著，名为《日英谚语考》，关注对日、英两个民族的文化中的谚语的比较考察。由此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对于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实证性比较研究的重视。

当然，在一般的“比较文化论”中，日本学者的学术视野也并非仅限于对某些具体的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象著名学者饭浩二的《比较文化论》，即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他不仅注意从政治、经济、技术、地理等不同方面对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而且将这种文化比较研究，升华到对整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异同优劣的理解。1992年，日本教育出版中心推出的芳贺登的《比较文化论》，视角也很独特。芳贺登的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他的“日韩文化交流史研究”。芳贺登这种研究，考察了日本民族文化的近代发展，论释了日本知识分子和民众同日本文化近代化的关系。芳贺登还以福泽谕吉为中心，具体地考察了日本“脱亚论和朝鲜蔑视论”的形成以及日韩之间学术文化交流与受容的情况。芳贺登的研究是基于比较文化的视角进行的。他实际上比较了中日韩三国文化的近代化发展历程。芳贺登认为，福泽谕吉关于中日韩三国文化的近代发展中，最大的歧异点是对西方学术文化态度不同的说法是正确的。在中日韩三国文化的近代发展中，对于西学认同受容的差异和实学思维发展的差异以

及由此引起的教育、社会制度变革的差异，导致了三国文化在近代发展结果的差异。福泽谕吉当年正是在比较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基础上，肯定西方文明的进步，认定中国文化落后，主张日本在文化方面“谢绝”东方的“恶友”，而与西方文明国家“共进退”的。芳贺登还认为，在日本文化近代化发展中，日本学者对于儒学的批判，使日本民族从中国文化主张的华夷论的影响下解脱出来，从文化心理上克服和否定大中华观念，是使日本文化完成近代转型的重要条件。日本在近代脱离中国文化的影响，全面地认同和摄取西方文化，在文化观念方面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以支那指称中国，以支那人指称中国人，以支那文化指称中国文化。芳贺登在其《比较文化论》中，较为具体地考订了支那一词在明治以来的使用和流传情况，以支那一词的使用，印证近代日本的“满清也成为夷狄”的观念的形成，印证在日本“大中华”观念的崩坏。（前几年，国内还有人考订支那一词的起源，否认支那是对中国的贬称，这些人若能看到芳贺登的《比较文化论》，不知作何感想。）芳贺登从中日韩三国文化近代化发展中某些具体的历史形迹，也提示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历程，应该正确地进行总结和反思。

在日本，以“比较思想论”的形式出现的文化比较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在这些从哲学、宗教、思想的层面进行的文化比较研究中，最重要者要推中村元的比较思想研究成果。

1993年，日本的北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比较思想”讲座。在其第一部中，收入了蜂岛旭雄的“先人的业绩”。蜂岛旭雄在论及日本比较思想研究的成果时，提到的学者一个是川田熊太郎，一个即是中村元。川田熊太郎毕业于东京大学，曾任教于东京大学、驹泽大学等高校。川田熊太郎的学术活动开始于对希腊哲学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即是《柏拉图的辩证法》。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川田的视角多在哲学方面，注意形上学、逻辑学、存在论方面的比较研究。中村元也是东京大学出身，但学术方向与川田有所区别。川田的学术活动开始于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中村元则毕业于东大文学部印度哲学梵文专业。中村元长期致力于比较思想方面的研究工作，学识渊博，著述繁富，是当代日本在比较思想研究方面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中村元在“比较思想论”方面的代表作是《比较思想论》、《比较思想史》、《比较思想的轨迹》以及他在90年代主编、由北树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思想》。

等。

中村元的《比较思想论》出版于60年代初。80年代有中文译本出版^①。中村元在为中文版《比较思想论》所作的序言中说:“在当代世界,各种不同的思想彼此对立、交流,并在相互批判的同时逐渐形成新的思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状况之下的我们,必然会把我们自己的思想同另外不同的思想进行比较。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们无法抗拒的命运。”从中村元的这种论断来看,他把文化思想的交流、比较同新思想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将比较思想理解为当今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这种观念,使得中村元在其《比较思想论》中,除了论及东西方文化思想的特征之外,十分关注比较思想论的历史发展以及当今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中比较思想研究方面的成果和进展。

《比较思想史》出版于1975年。在这部著作中,中村元以“文化圈”概念考察不同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辨析各种思想文化的同异,认定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某些相似的历程和特征。这部著作的内容,国内已有学者专门进行评介。《比较思想的轨迹》一书出版于1993年,全书包括“比较思想的提言”、“比较思想的会议”、“东方精神的受容”、“比较思想的研究成果”、“日本的比较思想”等五章。这些章节中,收入了中村元30多年以来在有关比较思想的学术会议上的报告、发言以及中村元关于比较思想论的短论等。中村元自己认为这部著作是展示自己数十年来比较思想论研究的“足迹”的著作。实际上这部《比较思想的轨迹》,也以十分珍贵的史料,总结和反映了当今世界上比较思想论研究的发展和现状。在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中村元不但关注欧美地区及日本本土的比较思想论研究,也十分关注中国的比较思想研究。他在“东亚的比较思想研究”一节中,介绍了中国的比较思想研究情况。中村元介绍了中国的佛学研究机构和中国宗教学会和南亚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佛学讨论会,介绍了吕、金克木等学者的部分学术成果。关注中国比较思想研究的情况,这种视角同《比较思想论》、《比较思想史》中的视角有所不同。当然,由于学术兴趣与专业方面的因素,中村元论及中国的比较思想研究的时候,范围仍是以宗教、佛教为主。中村元主编、由北树出版社在90年代推出的“比较思想”讲座(三卷本)中,则收入了一些日本学者在比较思想研究方面新的成果,并收入了少量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收入了韩国学者

金日坤的“儒教传统的再评价”,德国学者玛伊的关于海德格尔与老庄思想的比较研究方面的论文。这些成果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日本、韩国、德国学者在比较思想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进展。总之,中村元在比较思想研究中所展现的学识、造诣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在日本的文化比较研究中,涉猎比较文化方法论的学者也很多。在这些学者中,成就较为集中和显著的是蜂岛旭雄、三渡幸雄等人。蜂岛旭雄是早稻田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比较思想方面的学术研究。他的《思想与文化》、《比较哲学方法论的诸问题》、《比较思想概说》等论文中,都涉及到了文化比较的方法论问题。三渡幸雄是原京都女子大学教授,也是日本专治比较哲学、康德哲学方面的学者。三渡幸雄的《比较思想的学问》,即是一部比较集中地探讨文化比较方法论的著作。关于文化比较的具体方法,日本学者一般都主张实证的方法与哲学的方法结合。实证的方法包括文献的考察、社会环境的考察,历史系统的考察、文化类型的考察等;哲学的方法则包括本质直观的考察、解释学的考察、辩证法的考察、批判的考察、主体自觉的考察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学者关于“比较文化方法论”的成果中,虽然都论及了文化比较的方法(包括实证的方法与哲学的方法),但在这一类成果中还包括对方法本身的比较研究,对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蜂岛旭雄等人编辑的《比较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一书中,对方法本身的比较研究即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当然,对方法本身的比较研究,目的仍然在确立新的方法。依日本学者的观念,比较文化的方法,更应建构在对方法比较的基础之上。

从宏观的文化理论这种视角构思“比较文化论”的学者,主要是井门富二夫等人。这一派日本学者将“比较文化论”的学术分野定位于宏观的统合的文化比较,把“文化形态学”、“比较历史学”、“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发展的历史,理解为“比较文化论”的“前史”。井门富二夫一类日本学者,实际上将“比较文化论”理解为有别于文化人类学的新学科。在井门富二夫一类学者看来,“比较文化论”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担负起文化人类学所无法涵盖的更加广阔的文化领域的比较研究,或者说,“比较文化论”将统合不同学科领域中的文化比较研究。因此,在井门富二夫一类学者关于“比较文化论”的论著中,所着力论释的是“比较文化论是什么”,或是“比较文化论”的学科特质;所探

讨的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宏观的统合的文化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从而使这种从宏观的文化比较致思的“比较文化论”,也构成了日本文化比较研究成果中的重要内容。

应当肯定,日本学者的文化比较研究中,学术视角、旨趣、追求的不同,导致了日本学者的比较文化研究成果在学科归属方面的差异。但是,正是这些不同视角的研究,使得日本的文化比较研究,在层次上、学科上极为丰富,形成了日本文化比较研究的系统性、统合性特征。

三、日本文化比较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目标

日本学者多学科、多层次的文化比较研究,形成了日本丰富的文化比较研究成果,也使得日本学者对于文化比较研究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的理解和追求,不断深化,日趋理性。今天,日本学者将文化比较研究的价值目标一般都指向文化论和国民性论。这种文化论和国民性论的基本内容,是主张在比较不同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建构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的国民性所需要的“日本文化论”和“日本人论”。

“日本文化论”与“日本人论”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日本学者所认定的“日本文化论”,不仅追求在文化比较中,对日本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结构与特质的理论阐释,更重要的是要以这种“日本文化论”,表明日本文化建设中对方向的确定和途径的选择。“日本人论”则不单是要论释日本民族的起源和民族性特征,同时也要有益于其民族性的创新和发展,并以日本民族的国民性特征,应证日本文化的特征,使日本文化的特征与作为日本文化创造主体的日本民族的特征统一,以适应日本文化建设与国民性建设的需要。这样的理论追求,使日本学者讲究文化比较研究中有“我”,强调“我的比较思想论”,张扬文化比较研究中的主体性和目的性。日本学者追求的“日本文化论”和“日本人论”,即集中地体现了其在文化比较中坚持的主体性原则与目的性原则。这两种原则,规范着日本学者文化比较研究中的操作和趋向。使日本学者的文化比较,表现出一种与日本文化发展同步的共时性特征。

在日本学者看来,日本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化,大体上是沿着从文明比较到文化比较,从文化比较到哲学、宗教、思想比较这样的路径展开的。这种路径实际上也意示着日本文化在近代史上,通过吸纳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价值观念,实现现代化的发展历

程。近代史上,东西方的文化大潮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漫卷日本列岛。日本民族通过文化比较,在长期服膺以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之后,转而全面接纳以近代科学技术为标志的西方文化,确立和开启了自己民族文化近代化的道路。在日本近代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批判“现代”的学者,形成过“和魂汉才”“和魂洋才”“和洋折衷”等不同的文化观念。但是在日本,即使是那些基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批判“现代”的学者,在文化理念上与激进的“西化”论者的区别也只在于,前者主张日本民族在具备西方科技理性的同时,坚持东方的宇宙观念,使日本文化保留亚洲文化的形式。那些批判“现代”的学者并不排斥西方的科学技术。高度的国家主义观念,使日本民族将生产的工业化、国家的组织化,作为其近代史上共同追求的目标。可以说,日本民族在其文化近代化的历程中,始终不曾放弃于“西化”式的方向和道路。日本民族之所以能够坚持这种文化发展方向的思想基础,即在于其通过文化比较,从文明的层面对西方文化先进性的肯定和认同。

日本民族对西方文化的认同,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得到了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对外侵略扩张,曾经给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在战争中的失败,也给日本关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提出了一道文化研究课题。事实上日本学者在日本战败之后,即迅速开展了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审视日本文化的工作。饭

浩二在其“东方文化的反省”一文中曾讲到战争结束几个月之后,东京大学即举办“东方文化讲座”,目的即在于引导日本年轻的一代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反省日本文化的近代化,思考战后日本文化的重建和未来。一些日本学者认为,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是以高昂的代价验证了日本文化的落后。相比较于欧美文化,日本文化还未完成向近代的全面转型,日本人也还没有完全完成向“技术人”的转变。日本文化从总体上看,还包含不少“前近代性”的成份。这样的文化观念,使日本更加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更加坚定地走科技立国之路。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对日本从经济、技术上采取扶持的政策,使得战后日本的经济、文化、科技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种现实,又促使日本学者在文化比较中,更加关注对美国文化、苏联文化的不同层面的考察。“欧美文化与日本”、“日本人与俄罗斯人”

这一类研究课题,即反映了日本学者在战后的文化比较中的这种理论趣向。这种理论趣向表明 80年代以前,日本学者长期的文化比较研究,大体上都服务于日本文化发展方向道路的选择。因为,日本民族步入近代以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所要解决的文化问题,始终是在文明的层面完成其民族文化的近现代化。

随着日本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特别是在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解体,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之后,日本学者在文化比较中,开始以其“日本文化论”和“日本人论”为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在当今人类文化中定位。盛田昭夫等人的《日本人可以说不》一类的著作,以及在日本经济学界一度流传的“亚洲雁行论”,即反映了“日本文化论”的这种理论追求。

在“日本人论”方面,战后日本学者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美国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的影响。一些日本学者认同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比较观念和文化模式观念,称道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比较中运用的人类学方法,但不认同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的结合来描述日本民族的国民性特征。60年代,日本出版的长谷川松治译的《菊与刀》称定译本,书后即附有川岛武宜对《菊与刀》的“评价与批判”。80年代成文堂出版的《比较文化的进展》一书中,收有池田雅之的《日本文化论之现在》,其中也有一节为“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批判”。在日本,一些学者不赞同本尼迪克特的“日本人论”,除了学术文化观念方面的歧异之外,也因为战后日本经济文化高度发展。1977年再版的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将日本民族的国民性概括为忠君爱国;崇拜祖先,看重家名;现实的、实际的;喜自然、爱草木;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静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这种观念即表现了对日本民族性的褒扬,代表了战后“日本人论”的一种基本趋向。

进入 9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的文化比较研究,虽然也关注人类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主张通过文化比较,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协调和化解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但就终极关怀而言,其文化比较的目的则在于探索高

层面的日本文化的发展。日本学者一般都不否定其民族文化的“重层性”“杂交性”特征,但不满意在学术、思想的层面上,日本文化的主要内容仍是佛教、儒学和西方文化这种状况。他们希望通过文化比较,融会东西方思想,建构起更具自己民族特色的学术文化,以确立日本文化在当今人类文化中的整体地位。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开始重新组织对东西传统哲学和宗教思想的比较研究,即反映了这种追求。以文化比较服务于民族文化建设,在文化比较中捕捉文化发展机遇,追求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是日本学者在文化比较研究中,始终坚持的原则和方向。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日本文化曾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自近代以来,日本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即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成功地实现了向近现代的转型,中国人民却至今仍在探求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道路。造成中国文化发展中这种现实状况的社会历史缘由很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相对滞后恐怕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从“五四”时期到 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民族文化的持续复兴,也有几代人投身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大都集中于宏观的、笼统的、思辨的方式,缺乏现代科学方法,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基础。人们在论及中外文化问题时,常常是激情有余,理智不足。始终未能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形成多学科、多层面、系统的认识成果。这种状况,既影响了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识和继承,也影响了对民族文化成果的理解和借鉴。今天,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已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中的现实要求。满足民族文化发展中这种要求的重要途径,即是深入地开展文化比较研究。在我们开展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的时候,日本学者的文化比较研究情况,是值得我们认真考察和借鉴的。

注 释:

- ① 中村元:《比较思想论》,吴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出版。

(责任编辑 严 真)